

汉学家的摇篮
(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

李向玉

中华书局

本书出版得到澳门理工学院资助

序 言

陈胜彝

1999年12月20日,位于中国南海之滨、面积只有20多平方公里的澳门,一度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那里举行着被诗人形容为游子回归母亲怀抱的盛典。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也许只是这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而学术文化界对澳门的兴趣则更为长久和广泛。从16世纪中期开始,澳门这个狭小的半岛,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扮演着深刻影响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角色。它成为中国与欧洲诸强交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舞台。在这块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至今仍令人回味无穷的历史剧。由此形成的澳门独具特色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距今200多年前,曾经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管理过澳门的印光任和张汝霖就撰写了不朽的史著《澳门记略》。大约180年之前,瑞典学者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出版了他经过精心研究写出的杰出作品《早期澳门史》^①,成为最早的系统研究澳门历史文化的西文著作。时间

已进入 21 世纪,但学术界对澳门的研究不但没有随着澳门的回归而落幕,反而在持续升温。而且,研究澳门的学术队伍逐渐突破了人文学者的范围,使澳门研究领域呈现了多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一批专著、论文、辞书等成果的出版表明,澳门研究已是一项蓬勃兴起的学术事业。

这种局面无疑是令人鼓舞的。但在另一方面,比较了解这一学术领域的人士不难发现,在很多有关问题上,尚未产生令人满意的学术成果。就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领域而言,不少比较重要的学术问题的探讨,在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似乎就难以继续深入下去。甚至出现在较长的时期内,出不了开拓性的成果,同行之间辗转引述,研究水平原地踏步的情形。我想大家可能都会同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缺少对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问题作深入的专题探讨,二是在资料的发掘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一些具有使命感的学者已经觉察到这方面的问题,在最近一些年里作了富有成效的努力。李向玉先生即是其中的一员。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一书,是他耗费数年心血完成的一部专著。

正如本书所揭示的那样,圣保禄学院在澳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作为“远东传教士的摇篮”,曾经是辐射力达到整个东亚地区和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宗教重镇,在天主教东传史上具有毋庸置疑的独特地位。它作为与早期澳门城市相伴成长的教育机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澳门崛起的历程,因此在澳门教育史和整个澳门历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它存在和活动的岁月

里,为了宗教目的和其他原因从事东西方文化交流活动的不少西方传教士,都与这个著名的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它也以特定的方式影响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一个发挥过如此重要影响的宗教文化机构,当然是很值得研究者关注的。由于各种原因,以往的论著,特别是有关的中文出版物,对它的叙述基本上都语焉不详,甚至有不少讹误之处。研究该学院的西文论著也很少见,特别是有分量的专著仍然缺乏。因此,李向玉先生选择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无疑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其实,从《澳门记略》开始,历代研究澳门历史文化的著作,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圣保禄学院。历代学者中也不乏了解该学院之重要性的人士。之所以没有人对这个宗教文化机构进行认真透彻的研究,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人们对它的历史价值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难以寻找研究这个学院的资料,特别是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其历史面貌的第一手资料。有关中文资料零散而琐碎,无法再现当年之旧貌。似乎随着该学院在1762年的关闭,有关它的种种记载也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只在浩瀚的文献里留下若干蛛丝马迹供人们浮想推测。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如此。本书表明,有大量的与圣保禄学院有关的原始文献,至今仍比较完整地保存在葡萄牙的档案馆里。只是由于人们熟知的种种原因所造成的相互隔绝,才使关注数百年前往事的学者无法访问这段被尘封在档案馆里的历史。甚至连这批材料的存在,也并非广为人知。西方学者对这批文献的研究利用,也是晚近才出现的动向,而且也不够充分。李向玉利用多次访问葡萄牙

之便,到该国阿儒达王室图书馆,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查找、研究当年耶稣会士保存下来的文献,重点研究利用了这些资料中比较完整的、以古葡文写成的《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他在参考已知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在葡国访得的圣保禄学院原始文献作为本书的主要资料基础,这就使他的研究建立在比较扎实的史料基础上。这些资料,不仅使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而且必将为开展与澳门历史文化有关的其他课题的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参考。

以此为基础,李向玉先生力图通过仔细的研究再现圣保禄学院的历史。圣保禄学院从开办到关闭的始末究竟怎样?它的教学与管理制度的有什么特点?它的教师和学生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人物?附属于该学院的几个机构的情况怎么样?等等问题,原来都是人们不甚明了的问题。而系统地了解这些问题,又是我们全面了解澳门历史文化不可缺少的一环。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问题,作者在书中都进行了清楚的论述。有关该学院的基本史实,由此得到了比较准确的重建。这个存在过一百七十年、在各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院的基本情形,从模糊到清晰,显现在我们面前。书中对若干史实的叙述和考证,的确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如作者对圣保禄学院开办过程与目的的论述(见本书第一章),不仅弄清楚了相关的史实,而且还可以使我们对澳门在东西方交往中的地位和天主教早期在远东地区的传教策略,产生进一步的认识。又如,作者根据原始文献对圣保禄学院关闭时间进行了考证,具体时间为1762年。这个观点,

其实早已有人提出。龙思泰的《早期澳门史》就说过：“这所东方驰名的学府在 1762 年因葡王若泽一世的命令而关闭，其成员被遣散。”^①但直到最近，还有些学者坚持其他的说法。本书直接利用 1759 年葡萄牙国王解散耶稣会的命令，来证明圣保禄学院关闭的时间（见本书第 261 页），是令人信服的，大致可为这一似乎有争议的问题定讞。再如，作者对曾在圣保禄学院就学的华人教徒吴渔山和陆希言的情况作了一些介绍（本书第 115 页），相信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都会感兴趣。作者在集中精力研究圣保禄学院本身史实的同时，还注意放开眼界，将这个学院的历史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本书专辟一章，论述圣保禄学院在天主教传教史、西学东渐和中国文化西传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成绩。

总之，本书是研究澳门历史文化方面一部具学术价值的重要著作，必将对其他学术课题的研究产生有益的推动作用。当然，由于对圣保禄学院的研究可以借鉴的成果不多，研究的时间比较有限，关键性的资料远在葡国，并且以古代葡文写成，阅读利用不易，所以本书还存在一些值得改进之处，也是难免的。事实上，无论是在资料的挖掘方面，还是在史实的深入研究方面，本书都还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以本书的研究为基础，作者如能进一步努力，将会取得更多、更优秀的学术成果。

李向玉先生在澳门从事教育工作多年，近年又先后担任澳

门理工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长期以来,他对澳门的历史文化保持相当浓厚的兴趣。1997年,他开始在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学习,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这三年多的时间,他不仅在事业上不断进步,而且在学业上刻苦努力,奋发向上,在学术研究上开始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他在公务繁忙之余,努力不懈,坚持完成正常的学习任务,其精神实属可嘉。他对待学业态度极为认真,往来奔波于澳门和广州之间,虚心向我们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各位老师求教。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他的博士论文在答辩中得到多位著名专家的一致赞许。他在研究和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可谓历尽艰辛,矢志不移,克服种种困难,以严谨治学精神完成论文,显示他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时,也具有从事学术研究事业的才华。本书的出版,表明他的学术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他的导师,我感到高兴和欣慰,爰草是篇,以为序。

2001年1月于广州中山大学

一、选题的意义

今天，“圣保禄修院遗址”(As Ruínas de São Paulo)(通称“大三巴牌坊”)已经成为澳门的标志。凡是到过澳门的访客，以及通过各种媒体对澳门有所了解的人士，都会知道这个著名的修道院。但是，不仅一般人，甚至对中国教育史作过专门研究的学者，也未必知道在这个修道院里曾经建立过澳门的第一所大学，也是亚洲第一所西式大学——“澳门圣保禄学院”(Colégio de São Paulo de Macau)。例如，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高等教育史》^①和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教育史研究》^②，都完全没有提及这所学校。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有关这个学校的原始材料大部分用葡文写成，而且保存在葡萄牙等国，中国内地学者很难有机会利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方学者对这个学校也知之甚少。

随着澳门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其国际知名度的提升，特别是1987年中葡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确定中国在1999年12

① 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② 陈学恂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月 20 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越来越引起国人和世界的广泛关注,澳门的历史与文化也成为中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1993 年 3 月,澳门举行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历史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1994 年,澳门又举办了两个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即“第一届澳门历史文化国际研讨会”和纪念澳门圣保禄学院创办 400 周年(1594—1994)的“宗教与文化国际研讨会”。上述三个研讨会集中了不少中外著名学者,如内地的季羨林、任继愈、张岱年、汤一介等,香港的饶宗颐,澳门的文德泉神父(Pe. Manuel Teixeira),台湾的张春申,美国的马拉特斯塔(Edward Malatesta,内地译为马爱德)、维特克(John W. Witek),日本的迭戈·结成(Diego Yuuki)等等。在前两个研讨会上,有些学者提交了涉及澳门圣保禄学院的学术论文。而第三个会议的主题就是关于澳门圣保禄学院的研究,有十几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该院的历史与影响。本次会议对笔者有很大启发,本文亦参考和吸收了这次会议的一些成果。

笔者早些年对澳门历史文化进行过一些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澳门圣保禄学院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兴趣。1997 年 9 月,我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师从陈胜彝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当我同陈师讨论学位论文选题时,陈师鼓励我对澳门圣保禄学院作系统、全面的研究。他还反复指出,史学研究贵在求真求实,而原始文献资料在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由于以往研究圣保禄学院的成果对葡文文献的利用远不够充分,他要求我多收集葡文文献,并注意与中文文献互相参照,同时还必须注意吸收中

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遵照陈老师的指导,我拟定了赴葡收集有关澳门圣保禄学院历史资料的计划,并于1998年和1999年三次赴葡,寻找有关葡文史料,并颇有收获。在收集资料期间,我了解到国外一些学者正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1998年,笔者在阿儒达王室图书馆(Biblioteca da Ajuda—Palácio Nacional da Ajuda)^①查阅资料时,遇到从美国旧金山来的史密斯先生(Smith)。他是马拉斯塔塔神父的学生,也在研究澳门圣保禄学院。又有一次,在葡萄牙埃武拉图书馆(Biblioteca de Évora),我遇到两名日本学者,亦在查阅有关澳门教会的史料。由此可见,国外学者正在努力研究澳门宗教史与教育史。笔者深深感到,作为久居澳门的中国人,更有责任对澳门圣保禄学院作深入的研究。

我认为,现在我们研究圣保禄学院,在学术上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1. 澳门圣保禄学院从创立到关闭,存在了168年。它与早期澳门的历史密切相关。对圣保禄学院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早期澳门历史的了解。
2. 葡萄牙人在16世纪向远东扩张的同时,天主教亦加速

^① 笔者注:葡萄牙阿儒达王室图书馆位于葡萄牙里斯本市,曾是葡萄牙王室图书馆,藏有国王和王后的大量私人信件、外交往来函件、立法文件及许多公共部门的历史文献等,其中有关澳门的最重要史料是《亚洲的耶稣会士》(Jesuítas na Ásia),即澳门圣保禄学院档案馆所藏文件的大部分抄本。

了在东方的传教活动。以耶稣会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借助葡萄牙人的势力,在澳门建立了统摄远东教务的传教基地。因此,对圣保禄学院的研究,是明清时期天主教在华传播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3. 由于圣保禄学院是在中国领土上按照西方大学的模式建立与管理的,因此,通过对它的研究,我们可以对西方的教育制度、教学及管理方法引入中国的最初情况及其影响有新的认识。

4.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圣保禄学院在西方文化的东渐与东方文化的西传中,都曾起过重要作用。对它进行深入探讨,可以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实际上,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价值,而且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澳门是一个多语言、多文化的社会,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它有许多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正如季羨林先生指出的那样:“澳门文化是人类迄今四百多年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逆向交流和多元融合的独特产物,澳门的精彩之处和它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的重要性,也就在于那经由长时期东西文化交融所产生的客观存在的人文价值方面。”“澳门文化不只是人类一份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它必然要在东方的新世纪里继续闪烁独特的光芒。”^①季先生的这番话,有助于我们对澳门的多元历史文化及其现实意义的认识。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澳门的历史文化资源,加强研究,以促进澳门新的

① 季羨林:《澳门文化的三棱镜》,在澳门《文化杂志》1994年5月6日举行的《文化杂志》第二系列发行仪式上的讲话。

跨世纪的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二、关于澳门圣保禄学院的研究历史与现状

澳门自 1557 年开埠,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早在木帆船时代它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港口,并在 16 世纪名扬海外。葡萄牙人入居后,澳门逐渐发展成独立的商贸海港。数百年来,澳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始终与外部世界保持着频繁而密切的联系。西方的进步思想、科技成果和文化艺术首先传到澳门,然后又传到内地。因此,澳门在中国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东方人看西方的窗口,也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桥梁。澳门圣保禄学院创办于 1594 年,于 1762 年关闭,共有 168 年的历史。它在澳门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在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交流中曾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培养了一批历史文化名人,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发展及整个远东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大家认识到,要研究澳门的历史,尤其是澳门的教育史,不能不研究耶稣会及耶稣会士在澳门及内地的活动,不能不研究澳门第一所大学——圣保禄学院。今天我们应该客观地、历史地来看待它、分析它。作为历史,作为澳门史,尤其是澳门的教育史,应该有它的地位,应该写上一笔,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更值得我们重视;作为一所学校,它的教学体制、教学内容及方法、教学管理等都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目前,我们高兴地看到,文史学家在研究澳门史及澳门教育史时,已涉及到这所学院,并给予高度的评价。颜泽贤教授在为

《澳门教育概论》所撰写的序言中指出：

澳门地方虽小，但却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东西方最早的商贸中心，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基地和桥梁。400年前，传教士在澳门创办了远东第一所大学，培养了数百名传教士，澳门教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①

颜泽贤教授在肯定了圣保禄学院的历史贡献后，又指出了对它缺少研究的两个原因：

澳门教育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直以来研究甚少，其原因有二：一是澳门教育史料多为葡文，……不易使用；二是澳门教育的复杂性，……很难梳理，因此使许多研究失之零散或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次上。^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费成康先生1994年在他的《从“辞海”说起——对“澳门第一所大学——圣保禄学院”的评论》一文中也充分肯定了圣保禄学院的贡献，他写道：

据粗略的统计，列名《辞海》的圣保禄师生，就有汤若望

① 冯增俊主编：《澳门教育概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序”。

② 同上。

(Johann Adam Schall)、毕方济(Francisco Sambiaso)、艾儒略(Júlio Aleni)等十余人……他们的名字为《辞海》载录,就充分说明他们是所在时代的风云人物。而规模十分有限的圣保禄学院,在短短一百多年间,就培养出一群在沟通东西文化方面颇有作为的历史名人,它的教育质量便得到了最形象的体现;它对当时中国直至整个东亚的影响,也就可以想见。^①

迄今为止,我们仍未见有研究圣保禄学院的专著。有一些关于这所学院的专论或散见于各种史书的有关记载之中。因此,对它的深入研究,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一段历史研究的空白。随着澳门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范围不断拓展,对澳门教育史的研究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1993年以后,在内地、台湾、香港及澳门关于圣保禄学院的研究文章也逐渐多了起来。1993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黄鸿钊在题为《澳门和天主教在远东的开端》一文第五节谈到了圣保禄学院的一些情况:

澳门对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它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把许多西方人培训为中国通,使之有可能成为汉学家,同时又把许多中国人培训为通晓西学的人才。承担

^① 费成康:《从“辞海”说起——对“澳门第一所大学——圣保禄学院”的评论》,《澳门日报》1994年12月27日。

这种培训使命的圣保禄学院,可以说是培养汉学家和西学人才的摇篮。^①

1994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启臣发表了有关圣保禄学院的专论,题为《澳门第一所大学——圣保禄学院》,该文简单介绍了圣保禄学院办学的过程、课程设置,列出了1594年至1807年曾在该院毕业的九十八名耶稣会会士及入华传教的地点。在介绍了中国籍教士在该院学习后回内地传教的主要人员(如吴渔山)的活动后指出:

在澳门经过圣保禄学院毕业的中外耶稣会士纷纷入中国内地传教之后,使天主教的传教工作在南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浙江、江西、广东、广西等十二个省迅速开展,教徒与日俱增,据不完全统计,1585年只有20人,到1735年增至300,000人之多……可见,明清时期,天主教在中国内地传播之广深矣,也可见圣保禄学院在中国以至远东天主教传教史上之重要地位。可惜到了1835年1月26日,它被雷击起火而付之一炬……^②

① 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② 黄启臣:《澳门第一所大学:圣保禄学院》,载《文化杂志》[中文版],澳门文化司署1997年,第30期第38、39页。

黄文关于圣保禄学院关闭的日期有误,本文第一章第三节将具体论及。同年,中山大学历史系章文钦副教授在《吴渔山天学诗研究》一文中,主要论述了天学及吴渔山关于天学的诗以及吴渔山在圣保禄学院学道的生活,指出他们在这里“读书谈道,习格物、穷理而学超性”,从一个侧面反应了这所历史名校的一些情况:

三巴寺设有一所专门培养传教士的神学院,称三巴静院或圣保禄学院,创建于1594年。吴渔山和陆希言随柏应理至澳时,静院中的修士“衣服翩翩,吟哦不辍,从天主堂而出入。读书谈道,习格物、穷理而学超性。”格物指自然科学,穷理指哲学,超性指神学,与拉丁文和中文同为静院的基础课程。^①

在台湾,辅仁大学教授张春申神父于1994年发表了题为《圣保禄大学为我们的启示》的论文。在文中,他指出:

历史告诉我们:圣保禄大学和它的前身,曾为中国陶育出许多具有中国心肠的西洋伟大的传教士……圣保禄大学,不仅对西洋的耶稣会在华传教士,而且对国籍耶稣会传

^① 章文钦:《吴渔山天学诗研究》,载《文化杂志》[中文版],澳门文化司署1997年,第30期第125页。